

天城遗珍

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杭州出版社

天城遗珍

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城遗珍：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 = Hangzhou and the World: Cultural Relics About the Heavenly City : 汉英对照 /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杭州文史研究会编. —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65-0492-3

I. ①天… II. ①杭… ②杭… ③杭… III. ①中外关系 - 文化交流 - 研究 - 杭州市 - 汉、英 IV. ①G127.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9512 号

翻译：邓天中 殷牧云 颜钟祜

天城遗珍——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郑雅来

文字编辑：王 凯 沈 倩

美术编辑：苏晓东

出版发行：杭州出版社（杭州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印 刷：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27

字 数：320 千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65-0492-3

定 价：98.00 元

《天城遗珍——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叶 明

副 主 任：赵光育 宋 涛 包伟民 钮 俊 王利民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云川 王 英 王其煌 方新德 仲向平 沈建中

陈江明 周东华 郝志毅 顾志兴 倪素浓 徐海松

龚纓晏 楼毅生

主 编：楼毅生 方新德

翻 译：邓天中 殷牧云 颜钟祐

英文审订：Derek Schneider（美） Agnes Kneitz（德）

资 料：周 佳

前言

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以涌潮闻名的钱塘江，在它的东南边缘经杭州湾注入东海。北部是地势低平、河网密布的杭嘉湖平原。西部系浙西中低山丘陵区，天目山余脉一直向东延伸，在钱塘江北岸的群山之间围合成“西湖”，从而构成了杭州市区“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地理空间特征。

考古发掘表明，杭州人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8000 年前的“跨湖桥文化”。距今 5000 年前以杭州余杭区良渚为中心、辐射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更是迈出了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良渚文化早期，已将先进的稻作、制陶、玉石、纺织等生产技术传播到中原、岭南、台湾地区，乃至日本、朝鲜半岛。而在距今约 4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则吸收了来自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的因素。从跨湖桥到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杭州文化的多元、融合、开放和创新等基因，早就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

先秦时代，杭州隶属于越国或吴国的领地，在本地发展起来的吴越文化，又与中原文化、楚文化交流融合，成为当时华夏文明中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代表。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原来的吴越故地设置会稽郡，其治下的钱唐县即是杭州作为行政建置的起始。显而易见，钱唐之名源于流经此地而注入大海的钱塘江。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南巡会稽（今绍兴市），

往返两次经过钱唐县，此事被司马迁记录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这是古代杭州第一次见于历史文献记载。

从秦始皇南巡路线可以看出，钱唐县处在一条由北而南、以自然河道和人工运河相连接的交通节点上。古代杭州首次以“钱唐”之名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时就有一种通江达海、融汇四方的禀性。此后，“钱唐”之名贯穿于秦汉六朝 800 年间。

秦汉六朝时代的钱唐县成为北方流徙人口的定居点和中原王朝经略东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尤其是东晋、南朝时期，北方陷入持续的战乱动荡，而南方相对稳定，并掀起开发高潮，来自西域、天竺的僧人跟随晋室南渡，将外来的佛教文化引入杭州。东晋咸和初年，印度高僧慧理初创灵隐寺，成为传承至今的杭州最早的佛教文化遗产。

公元 589 年，隋朝废郡设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两年后在凤凰山麓创建州城衙署。610 年，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并沟通钱塘江，再经浙东运河连接绍兴、宁波，使杭州居于江、河、海三水之会，兼具河港和海港的双重功能，成为海内外贸易的南方枢纽。唐代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檣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虽不免夸张，但杭州确实成长为海内外的商贸大都，一跃成为“东南名郡”。

8 世纪末，中日之间开辟了一条利用季风横渡东海的新航路，日本遣唐使大多以浙江的明州（今宁波）或杭州湾为登陆点。由明州登岸的海外商贾，亦可循浙东运河到达杭州。由陆路而来的西域胡商（也称商胡），也辗转从运河进入杭州，诗人杜甫称“商胡别离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诗中的西陵即西兴（今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在钱塘江南岸，为浙东运河与钱塘江衔接处，连通江南运河。

唐代时，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和侨民聚居在今日杭州羊坝

头一带的“蕃坊”，并带来了伊斯兰文化。相传唐代有埃及富商欧斯曼本·阿法尼在洋坝头独资建造了真教寺，这便是杭州凤凰寺（真教寺）的前身。但此说迄今仍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的国都，统治者采取“保境安民”的国策，不仅长期维持国内安定，免遭战祸，而且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成为乱世中独享和平发展的一方净土。杭州由此一跃成为东南地区一流的中心城市。处在分裂割据时代的吴越国迫于形势，大力扶持海上交通。

吴越国与朝鲜半岛（新罗、高丽、百济）、日本、印度和大食（阿拉伯帝国）都有交往。其时吴越国都城杭州享有“东南佛国”之称，许多名僧蜚声日本、高丽，汉文佛经也大量传入高丽。吴越国时期，不断有高丽、日本高僧前来求学，末代国王钱俶曾仿照印度阿育王造塔故事而建造“宝篋印经塔”，通过吴越商人和日本僧侣传入日本，在以后的数百年间，日本国内还造了日本式“宝篋印经塔”。此外，钱俶曾经通过海商向日本回购国内已经散佚的天台宗经典，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北宋时的杭州跃居“东南第一州”，更有“地上天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海外交流也日趋兴盛。其主要推动力，除了地方经济繁荣外，还有三大动因：杭州官方造船场的建设、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设立、罗盘导航技术的应用。因此，北宋杭州“道通四方，海外诸国，物货丛居”。

南宋定都杭州，称“行在”，升为临安府，历时 138 年，既是全国第一大都会，又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这是杭州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对外关系上，南宋因偏安江南，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更加

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同时，宋代制瓷技术日趋成熟，兼具生活和艺术价值的精美瓷器，逐渐成为大宗出口商品，而瓷器更适合海上运输，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南宋杭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宋元易代，都城临安没有遭受毁灭性的战争创伤，作为帝王之都积累下来的城市遗产大都幸运地传承下来。元代杭州作为江浙行省首府，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仍然无可撼动。元代的对外关系，由于其开放的对外政策、四大汗国的建立、驿传制度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而步入极盛时代。元初来杭的海舶大多通过澉浦（属今浙江海盐）作为中转站，进入钱塘江边的港口。元政府于1283年在杭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管理活跃的海外贸易。1293年，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课提举司。此后，西域各国的商人、传教士、使臣、旅行家纷纷来到杭州，元代时的杭州俨然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概而述之，宋元时代杭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与日本、高丽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中。

（一）宋日交流：宋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主要是由两国僧人构建的。尤其是南宋时的杭州，因其都城地位，来访日僧数量远超其他各地。日僧参禅求法的佛寺主要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竺三寺等。宋日文化交流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佛教文化、茶道文化和艺术文化等方面。

南宋来杭求法的日僧圆尔辨圆，即是余杭径山寺住持、禅宗领袖无准师范的第一个日本弟子，也是第一个真正师承径山法系的日僧，回国以后弘扬禅宗，被称为日本佛教第一位“国师”、日本禅宗泰斗。同时，东渡日本传法的高僧有径山寺的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此外，入宋日僧带回去了大量书籍，除了佛经之外，涉及中国儒学、兵法、医学等内容的书籍占了三分之一。

日本的茶道文化渊源于唐宋时形成的杭州余杭“径山茶宴”。入宋日僧成寻、荣西、希玄道元等人都是茶道东传的重要角色。而真正将“径山茶宴”引入日本，并使日本禅院茶礼完整化、规范化的是日僧圆尔辨圆、南浦昭明和赴日弘法的杭州径山寺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日僧南浦昭明于1267年回国时，将径山寺住持虚堂智愚赠送的一套径山茶台子与茶道具，以及七部中国茶典，一并带回了日本。有学者考证，南浦昭明带走的“径山茶台子”其实是用来做末茶的茶磨和茶磨盘，也就是今天日本的专利产品“抹茶石磨”的原型。日本茶道由此开始。

入宋日僧也促进了宋日音乐、书法和绘画艺术的交流。圆尔辨圆曾师事宋代书法家张即之，并得书法家无准师范禅师的秘传。圆尔回国时，又带回许多宋代书法拓本、书帖和无准的部分墨迹，至今仍有不少无准手迹留存于日本。日僧心地觉心赴杭州灵洞护国仁王禅寺，师从无门慧开禅师，学习吹奏尺八，返日后，在日本普及尺八。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的尺八，在宋代以后逐渐消亡，却在日本成为风靡全国的国乐。入宋日僧俊芿，先后至杭州径山寺、下天竺寺等地求法，1211年回国，携带了大量典籍、佛具和绘画作品，其中有杭州开化寺比丘尼正姊所赠《水墨罗汉》十八幅、杭州灵芝寺《大智律师元照像》（现藏美国）以及《南山律师道宣像》（现藏日本京都泉涌寺）等。

（二）宋丽交流：相比宋代的中日关系，宋与高丽（今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更具官方色彩。宋丽之间长期保持着贡赐形式的官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宋丽官方文化交流的媒介之一是书籍。北宋政府曾两次赠送高丽使者《开宝大藏经》，以及儒家经典和史学名著《史记》、《汉书》、《三国志》等，这些书籍大都是杭州刻印的。高丽还在南宋时传入的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这是宋丽文化交流结出

的硕果。高丽王子僧统义天，北宋末来杭州求法，入住慧因寺，由此演绎出一段杭州慧因高丽寺与中韩文化交流的佳话。

（三）中西交流：南宋时，来自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等地的各国商人和使者，前来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进行朝贡贸易活动。元代时的杭州借助昔日帝都的余辉与江南最大行省首府之地位，吸引了西域各国尤其是欧洲的商人、传教士、使臣、旅行家纷纷东来。宋元时期杭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表现和突出地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元时代，杭州从首都到省府，始终作为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出产地和集散地之一，尤其是青瓷的出口广受欢迎，与明州、温州、泉州、广州等沿海港口一起，沟通一条中西海上陶瓷之路。

第二，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中有三位先后来杭州游历，即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元顺帝时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黎诺里也途经杭州。这四位旅行家的游记都记录了他们印象中的杭州。《马可·波罗行纪》第一次向西方世界详尽地介绍了杭州，早期欧洲地图上“行在”（杭州）具有显著的重要地位；而来自北非摩洛哥的穆斯林伊本·白图泰第一个把杭州介绍给了非洲人民，并且使得杭州的美名远扬于穆斯林世界。

第三，宋元时代的杭州聚集了大批来自西域和阿拉伯国家的外国侨民，有犹太（时称主鹑、术忽）、印度、波斯（今伊朗）、埃及以及崇拜太阳的土耳其人。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中亚、阿拉伯等地的回回人，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信徒，还有来自西域的基督教徒“也里可温”。

当时的杭州还出现了穆斯林聚居区和公共墓地。穆斯林主要聚居于杭州城内的保佑坊、文锦坊、羊坝头一带。其中定居于文锦坊南祖籍波斯的回回大师阿老丁，重修了杭州真教寺，俗称礼拜寺，即后代改称的

凤凰寺。穆斯林墓地位于清波门外西湖之滨的聚景园(南宋时皇家园林)。元明两代皆称“回回坟”，清代又称“番回冢墓”。1911年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正式命名为“南园回教公墓”。1924年杭州市政府因修筑环湖公路，开始拆迁部分坟墓，至1953年大规模建设西湖风景区，公墓整体迁移，先后在墓地发掘到古墓碑70余方，几经流失，现收藏于凤凰寺内，至今遗存20方元代阿拉伯文古墓碑，1方明代古波斯文寺碑。

由于这些古碑年代久远，而且采用特殊的碑铭字体，释读起来非常困难，中外学者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探索，终于释读译注完成，于2015年出版《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一书。从专家释读的墓碑铭文可知，在这些墓主中，其来源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和突厥人；其职业有商人、行省高官、军事官员以及纯粹的宗教人士；从宗教派别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这批墓碑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其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这反映了元明时代杭州的穆斯林在保持自己宗教文化传统的同时，已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杭州人民历经千百年保存下来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交流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元末明初，杭州屡遭兵火、疫病和强迫迁出富户等多重打击，城市元气大伤。虽然明朝初年仍以杭州为浙江行省首府，但杭州在全国的地位已然下降，不仅失去了全国一流城市的地位，连东南第一州的地位也被明初首都南京超越。直到明朝中期，杭州经济才得以复苏，并在明代后期再度复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手工业城市，万历年间杭州城市商业人口已达“烟火数十万家”，重现繁华都市景象。

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于1645年置杭州府，仍为浙江行省首府。清前期的杭州，总体上在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以传统书院教学、书画艺术、藏书印书、西湖园林之兴盛为标志的杭州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对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奠定了杭州在长江以南帝制时代后期的中心地位。

明代时杭州的对外关系，前期受制于海禁政策，官方层面的对外交往，只有通过宁波港开展一些“勘合贸易”（也称贡舶贸易）。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杭、嘉、湖三府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急需开辟新的市场，海上私人贸易空前活跃，明朝的海禁政策难以为继。嘉靖年间，位于浙江舟山东南的双屿港成为东南沿海最大、最有名的海上走私贸易港口，参与其间的有日本、葡萄牙、东南亚等各地商人，甚至省城杭州的牙商、店主也帮助海商在杭州大量收购布帛、丝绵、油麻、皮革等商品，形成一条杭州、宁波、双屿的海上走私贸易线。期间，日本的“勘合贸易”使团在滞留宁波、杭州时，伺机进行一些私人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

明代晚期，由于政局混乱、“海禁”松弛，海上交通大为畅通，许多浙江人东渡日本，或经商或游学。明末清初更有大批中国人到海外各地求援、避难、经商谋生等，仅东渡日本的士人和僧侣，有名籍可考者就有 50 余人，从而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东渡人士中，从杭州出发的陈元赟、戴笠和东皋心越，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备受日本人民崇敬。

明朝的海禁政策，真正受到的挑战和冲击的是来自欧洲的早期商业殖民势力，以 1557 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为标志，明朝的对外关系由主动变为被动。随后而来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带着传播西方宗教的使命，推行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策略，恰逢变革思潮兴起的晚明社会和处于思想裂变中的士人群体，因缘际会地引起了中

西两大文化系统在历史上首次面对面的接触、碰撞和交汇。

明末清初来过杭州从事传播宗教和西学活动的欧洲传教士，至少有几十位，他们的欧洲故乡包括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安葬于杭州市西溪桃源岭下大方井天主教墓地，又称卫匡国墓。

这批西方传教士在杭州不仅建立教堂、开办教会学校，并且与中国士人包括杭州籍的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大批西学书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李之藻主编出版的第一套西学丛书——《天学初函》，引进和传播的西学知识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等诸多学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末清初在杭州活动的欧洲传教士，通过他们撰写的著作、书信、报告、回忆录等形式向西方大量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面貌，充当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之学双向交流的先锋。其中两位长眠于杭州的意大利传教士金尼阁和卫匡国就是的杰出代表。

金尼阁的突出贡献在于通过编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引进 7000 部西学书籍、在杭州刊印自编著作等，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儒家经典和历史的先驱。

卫匡国长期定居杭州，他在欧洲出版《鞑靼战纪》《中国新地图集》等著作，使他赢得了“中国地理学之父”的称号，而在杭州出版的《逖友篇》，由杭州士人张安茂作序，称卫匡国为“西方大儒”，该书专门阐述了何为“真友”、如何交友等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体系，并引述西塞罗等西方哲人名著，在清代士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由欧洲来华传教士开启的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高潮中，出现了一批直接与欧洲传教士面对面交流的中国士人群体，其中最为著

名的就是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而李、杨二位均为杭州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徐、李、杨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实学派士人，他们虽然直接接触西教西学，甚至成为天主教徒，但他们没有放弃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以引进西学、会通中西的理念，与西方传教士共同研读、翻译、出版西学著作，并且竭力试图在宗教和学术上辨析天学与儒学、西学与中学的异同，从中寻找一条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

但是，传教士和实学派士人引进的西方宗教与科学知识，却遭遇了保守士大夫和佛教界人士的强烈排斥。其中以杭州云栖株宏和虞淳熙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与以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展开了一场中西宗教文化之间的激烈论辩，震动整个士林学界，甚至于引发教案事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杭州既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传播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之重地。

清前期的中西关系呈现复杂的局面。即便进入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对于海外贸易仍然有着严格的限制政策。而新兴的西方强国英国，为改变清廷的贸易限制政策，派出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9月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但未能完成使命。10月，使团离开北京，沿运河南下至杭州停留数日，马戛尔尼本人和使团其他成员考察并记录了杭州城市和西湖风貌，提升了杭州在欧洲的知名度。

不过，清代前期杭州的中西文化交流，仍由入华欧洲传教士担当主要媒介。继卫匡国之后，主持杭州传教事务的是意大利人殷铎泽，他在将儒家经典“四书”的西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整理出版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学界称为“将孔子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1678年，他在杭州购地，扩建大方井传教士公墓，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至杭

州时，曾与殷铎泽会面。

清代前期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直到传教士内部的中西“礼仪之争”渐趋激化，最终导致清廷禁教，罗马教廷于1773年颁令解散耶稣会而宣告中断。

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留给杭州的还有一份特殊的遗珍，那就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它收录了包括李之藻主编《天学初函》在内的西学东渐成果，而这部文化典籍在南方唯一幸存至今的只有位于西湖边的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势力加速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军队两进杭城，使杭州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兵燹之灾，城市人口锐减，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杭州被新辟为日本通商商埠。1896年9月签约确定杭州拱宸桥一带为通商场地，其后杭州海关（俗称“洋关”）开关（关址在今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内），10月1日杭州日本租界与通商场正式使用，关税也于同日开始征收。至此，杭州正式开埠。

1897年冬，杭州海关设嘉兴分关，受杭州关管辖，但重要职位全为洋员占据，以税务司为首的洋员掌握了一切大权。早在杭州开埠前，日本已派员来杭州物色设立领事馆的处所，后来择定西湖北岸、宝石山东麓（今石函路1号）为领事馆所在地。1896年3月正式开馆，日本在浙江的势力，包括日租界都须听命于驻杭领事。英国也于1897年设领事馆于拱宸桥，并派设了驻杭领事。其他西方国家没有派驻杭州领事，一般委托英国领事代为照管各国在杭有关事务。

随着杭州开埠和海关的设立，外国商品大量涌入，西方列强竞相在

杭州投资设厂，杭州本地及附近各县的自然经济和民族资本受到很大冲击而不断衰落。尤其严重的是外国商人还大量输入鸦片，危害杭州人民。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各国商人又纷纷在杭州开辟航线、铁路，从而加深了杭州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和商品的侵入，其背后包含的近代文明成果，也让杭州人民深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先进，而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一部分商人、地主豪绅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商业，从设厂制造开始了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内容的经济变迁过程，从探讨制造技艺开始了以引进西学为内容的文化变迁过程。总之，在晚清民族危机的刺激和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杭州的近代工商业开始起步，近代教育、卫生、交通、报刊、通信、市政设施等开始兴办，从而开启了缓慢而持续的杭州城市近代化进程。

考察杭州城市近代化和社会变迁的轨迹，尽管带有某些半殖民地化的色彩，但是西方文化的引进、传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外来刺激因素。近代杭州的中西文化交流，以西方传教士、西方学者、开明人士、留学生为传播主体，以新式学校、报刊、通信和市政公共设施为主要载体。

近代杭州教育是在西方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和部分开明士人效法西方学制创办新式学校之后开启的。早在杭州开埠之前，西方文化已逐渐传入，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杭州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到杭州进行传教活动的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其中基督教教派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如来自英国的圣公会，来自美国的浸礼会、南长老会、北长老会等，而天主教则主要来自意大利和法国。这些教派的传教士来到杭州以后，除了进行传教活动外，还建立了一些教会学校，尤其是开埠以

后，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并逐步建立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一整套教育体系。至1911年，杭州有教会学校10所，其中小学5所、中学3所、高等学堂2所。民国时期，杭州的教会学校继续得到发展。

近代杭州的教会学校首屈一指的就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建的之江大学。它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对杭州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民初时杭州的教会学校不仅培养教会的宗教人员，而且向杭州社会输送了大量具有新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如1906年英国基督教安立甘会传教士梅藤更在杭州建立的医科学学校——广济医学堂和广济药学堂，培养医科人才，为西方医药医疗事业的传入和普及作出了贡献。1912年合并贞才女学堂、育才女学堂和蕙兰女学堂而成立的私立弘道女子中学，从1915年开始开设师范科，为学校培养师范类人才。之江大学1916年的毕业生中有郁达夫、朱孔阳、范烟桥、高镜明等知名人士。可见，近代杭州的教会学校在客观上也培养了第一代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对杭州近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部分开明士人效法西方学制，在杭州创办了新式学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杭州知府林启分别于1897、1898、1899年创办的求是书院、蚕学馆和养正书塾。求是书院注重实学，特别重视“西学”的传习，并开各省派遣留日学生之先河，造就出浙江第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书院屡经更名，1902年改称浙江省城大学堂，即今浙江大学的前身。蚕学馆的创办是杭州职业教育的开始，它聘请日本专家讲授研讨专业知识，学馆毕业生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批蚕丝实业、科技教育的骨干，学校几经更名，即现在的浙江理工大学。养正书塾则是我省最早创办的普通中等学校，1901